

理论特稿

倡导“为人生”的美育

■马建辉

为什么而美育,是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所倡导的美育应该是“为人生”的美育,通过改良人的精神和心灵进而来实现改良人生的目的。美育是以美来化育人生,其立足在“美”,路径在“育”,目标在“人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里的“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正是“美”通过“育”发挥其建构人生的作用的结果。美如果不能影响到人心,作用于人生的改良,便毫无美育的价值。

因此,美育必须回归人生本位,以审美的精神去建构人生、发展人生,实现“以美成人”的目标。人生美育应确立起以下三个基本观念。

主导人生的“立心”观念

“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语)。美育工作实际上就是“立心”的工作,即在人的内心深处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通过“立心”来主导人生、改良人生、发展人生、完善人生。“立心”是人生美育的根基,也是人生建构的内核。

毛泽东曾倡导人们要学习白求恩“毫无私利之心”的精神,人生美育的“立心”要实现的就是使人们拥有一个高尚、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生。情感和精神在根本上总是依附于冰冷的物质世界,审美可以帮助人生减弱这种依附关系,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境界或超越境界。而“立心”或审美对于人生的主导,总是在这一升华和超越的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是一种从私欲中挣扎、挣脱的进程。审美的挣脱就是人心朝向美的洗礼、净化。人的美感获得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超拔和升华的净化过程,而美感一经获得就会成为引领人生和驱动人生的精神动能,这就是美育,“立心”的关键也在于此。

经由审美主导的人生,就会达到一种“忘我之境”,即“升华之境”,它所忘掉、所升华的就是世俗之我、私欲之我、日常之我、物

学者观点

公共治理需媒介参与

■胡远珍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丛生的风险期,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执政兴国重大战略举措。国家治理体系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一体多元”转变,形成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治理体系。在这种新型治理格局中,媒介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媒介在社会公共治理中的地位

在国家新型治理理念框架中,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媒介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治理主体,在当下治理问题呈现多重性、复杂性、叠加性、风险性的情况下,其主体地位越发重要。

媒介是制度建设的推动者和参与者。社会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公共权力有效约束,要求拥有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完善和创新社会公

共治理机制,而媒介拥有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社会广泛动员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一方面可为政府进行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提供依据,当好参谋;另一方面也拥有为各方社会利益主体提供协商、对话、表达沟通的平台,成为社会公共治理创新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媒介是社会主体意识的启蒙者和动员者。长期以来,在“全能型政府”的主导下,社会力量发展微弱,其主体意识也受到抑制。公共治理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特别是社会公众积极的参与,这就需要媒介通过组织动员、思想启蒙、引领示范的强大传播功能,不断培育和激发社会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首先是以理性精神正确看待和认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其次是以法制规则意识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明确其责、权、利的边界;再其次是具有进行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意识,承担好公共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媒介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宣传者和监督者。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多方合作共治的主要方面就是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涉及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涉及公共资源和服务的供给与增值等。当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

节制人生的“立德”观念

真善美在人生追求中的贯通和有机统一,是人生美育的精神实质之所在。美,不是放纵的产物,而是节制的产物,美育亦然。“美育即情育”,就是指其可以节制和化育人们的情感和基于情感的诸种欲望,使之合于真善美的要求,符合理性和道德规范。

蔡元培先生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指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也说,“伟大的文学家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真正伟大的艺术是节制的,而非泛滥的。在这一点上,艺术的本质是与人生美育的本质相一致的。因此,美育必须确立起节制人生的“立德”观念,即让善与理性成为审美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品质。

从节制人生的“立德”观念来看,美育应是聚焦人生整体发展的

综合性教育,即美育虽偏重于“以美育人”,但却是真善美并举的有机教育、整体性教育。这是由其以人生为本位的精神实质所规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这里的“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就是要我们节制人生以“立德”,这就是审美对于人生的真义和价值所在。这样的美育才能真正回归人生,真正抵达“成人”的境界。

美育不能为了强调其独特性,把思想性剥离出来交给智育,把道德感剥离出来交给德育,如果把二者都剥离了,美育还剩下什么呢?诚然,美育是情感的教育,强调精神和心灵的教养,但如果如果没有思想性和道德感,情感就会失去方向、步入迷途,那怎么来落实情感的教育呢?

美育就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美育不能只停留在审美境界,而在“参与”和“建构”的意义上,创造人生的“立行”观念才成为人生美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青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些话是有着美学与美育的深刻道理的,它告诉我们,美创造美的人生,同样,人生也创造人生的美。美育就是要创造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并为此而“立心”、“立德”、“立行”,最终达致“成人”,这才是其真谛之所在。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媒介作为党和政府重要的执政资源,以其专业性所形成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独特的角色作用。



美育就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禹天建 绘

要从事审美境界向现世人生回归,发挥其影响、主导和引领现世人生的功能;与其相关联的美学也不能陷于纯粹的抽象思辨,将自身视为一些概念或范畴之间意义往复循环的游戏,甚至把审美也当成概念演绎的产物。对于艺术教育来说,如果想发挥其美育功能,就不能只注重技艺知识的方面,而应在这个基础上挖掘指向人生的思想情感内容。“为人生”的倾向或指向明确了,就可以做到把理念、技艺、知识重新人生化,让审美具有人性,让美育恢复其化育人生、创新人生、完善人生的现实功能。

在我们这个时代,构建人生美育,可以改变人们把美育只当作“奢侈品”而非“必需品”的误解,也是美育重塑责任、重建庄重的必由路径。

(作者系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

论道说理

政治生态建设 须防官场结盟现象

■王永华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这是党中央对净化政治生态的新认识、新部署。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整个政治系统运行有序,政治生态总体上正常、健康、向上的,但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态建设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官商同盟圈、官场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是政治生态污染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一些腐败窝案发生地,领导干部与商人的正常来往、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完全取代,形成了畸形的官商勾兑同盟圈和官场利益同盟圈。这些圈子的形成,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比如,在一些煤炭、稀土等资源富集地区,由于老板多,其政治生态更加错综复杂,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态渗透到党政机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与官商同盟圈共存的还有官场同盟圈:在失控的权力周围,形成了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并且催生了“卖官掮客”。在这些圈子里,不仅官员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还通过一些“地下组织部”、“卖官掮客”的奔走,不断吸收新成员加入,使腐败圈子如“滚雪球”般增大。官场和商场的利益输送,官场和官场之间的利益输送,既搞乱了干部价值取向,侵蚀了干部队伍肌体,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扫描国内腐败重灾区,无不反映当前一些地方政商关系异化,拜金主义全面侵入基层政治生态。官商一旦结成灰色利益共同体,通过“场外搞勾兑、场内走程序”,容易使钱权交易“合法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管,这种腐败就可能变为制度性腐败。如今,中央八项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反四风不断荡涤污泥浊水。在一些地方,反腐前,商人和官员“藤缠树”,反腐后,商人和官员互相躲着走。其实这二者之间始终未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地方党政官员因为招商引资等工作必然要和商人打交道,正常的交往无可厚非,但要防止利益结盟。

针对腐败重灾区官商勾结问题,许多纪委办案人员和反腐专家通过大量案例分析认为,这与当地行政审批权力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信息公开不够等原因有关。行政审批权易成为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市场的工具。对此,只有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能够由市场机制本身决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权力,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此外,不管是在制度健全完善方面,还是在人们的规则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强化方面,都应当格外重视金钱与权力的分离。

防止官场利益同盟也是保持政治生态健康的重要方面。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成为地方“实力派”,经营几十年,人脉关系根深蒂固,年纪较大时,往往容易产生退休前在经济上捞一把、让“跟随”自己的干部得点好处的想法,一些不良风气往往就此形成,甚至就此形成“腐败小圈子”。防止官场结盟,关键在于公私分明。实践表明,公私边界模糊,恰恰是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根源;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重心。

要建立公私分明的官场文化氛围,一方面要探索领导干部回避制度、异地任职等制度建设的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要严格党内生活,防止党内生活庸俗化。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许多地方的民主生活会都开得很高质量,领导干部之间毫不留情地开展批评,这种良好的势头如能持续下去成为常态,无疑是防止官场利益结盟的一大利器。

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通过斩断官场结盟,重塑我国干部队伍的新形象,才能创造出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与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交相辉映的新气象。

(作者系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理论时讯

“20世纪高等教育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提出——借鉴百年来我国高教发展的有益经验

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与《山东高等教育》编辑部主办、泰山学院承办的“20世纪高等教育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最近在泰安举行。来自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及教育部评估中心、山东省委高校工委、重庆市教委、泰安市委的专家学者,就“20世纪高等教育与中国社会”的诸多课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度研讨。

如何借鉴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深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高等教育理论亟待研究探讨的重大课题。专家学者认为,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20世纪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为迅猛、进步最为显著、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同时,高等教育发展也牵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梳理总结20世纪高等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双向互动,有助于厘清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得失经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凝聚共识、奠定基础。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中清教授,分别作了《地方高等院校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支点》和《中国高等教育精英四段论,1865—2014》的报告。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山东高等教育》主编齐秀生认为,在深思过去百年的中国高等教育之后,必将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开出良方。(张兴华)